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

观察丁玲

陈漱渝 主编
杨桂欣 编

下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
主编 陈漱渝

观察丁玲

杨桂欣 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三 访 汤 原

陈 明

一 访

失 踪

1967年11月13日。天还没有亮，我为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所惊醒。我习惯地碰碰睡在身旁的D，轻声道：“又来了！”D还没有恢复日来的疲劳，来不及说一句“什么”便弹簧似的一跳坐起来了。两个带红袖章的人莽撞地拉开了中间屋子的门，又拉开了我们这间卧室的门，立在炕头，连声嚷道：“起来！起来！”

我拉了一下电灯开关，微弱的黄色的十五支光的灯光映照着这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。我也掀开被子，穿衣起来。

他们连声催着D：“快，快穿！”D没作声，她镇静而

迅速地穿衣。一转眼他们便簇拥着 D，旋风似的离开了小屋。

我披着棉袄，追到门外，只有满天星斗悬在寒冷的夜空，残月透着微红的凄惨的光浮在西边的地平线上，我像落在一个毛玻璃似的世界里，在淡淡的雾似的光亮中望着寂静的四方，看不到一人，听不到一点声响。我跑到街头，零落的几盏街灯，孤寂地闪着淡黄的光。右边是到医院去的大道，左边是到 B 派造反指挥部去的路，都不见 D 的踪影。我张皇地往回走，忽然脚底踩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我伸手拾了起来，原来是 D 的那块包头用的蓝色线头巾。我又惊又喜地紧捏着它。早晨特别冷，她是在慌乱中遗失的还是有意丢在这里的？我茫然望着路的两头：D 呵，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了？我一定要找到你！

当我穿好棉衣，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，天已经明了。下夜班的，上早班的人，都穿得厚厚实实，原来天气已经很冷了。D 只穿一件薄棉袄，一件旧皮背心，大衣还留在家里。她到底给抓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她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？我必须到 B 派的指挥部问个明白。

我走到原基建队红楼外面的操场上，四五个带袖标的年轻人抱着一个篮球，从楼房东的大门蹿出来。他们看见我便吼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快走开！”我说：“我要找指挥部的负责人。”“找他干什么！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你搞什么乱！”说着有几个便捏着拳头向我奔来，嚷道：“打！摘

帽右派，不是好东西！”其中一个跨近我的身边，两个拳头在我面前一晃：“快走，小心砸断你狗腿！”边说边对我使着眼色。看来指挥部我是进不去了，只好退了回来。

我转到农场的公安分局，原来这时的公安分局属农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。我把情况向他们讲了，问他们是否知道D的下落。他们猜测道：“可能抓到生产队去了？也许还在总部。”他们既不知道，又无法管，更不会替我打听。我只得离开了他们。

太阳照射在雪后被踩得乱七八糟的大路上，路边残雪中积有许多落叶和大字报的碎块。文化宫前面的广场，从前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松枝柏叶，长年翠绿，职工、老人、小孩子都喜欢在这里碰面，晒太阳，休息，谈天。现在这里是一片灰色的积雪，露出一些碎砖乱瓦土疙瘩。我踟蹰在这里，苦苦思念着突然被劫走了的亲人。

忽然，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旁响道：“老陈！到哪儿去？”原来是梁东，他是文化宫的工人，我们一向相处很好。文化大革命一来，见面很少了。旧友重逢，我也很高兴，忙说：“许久不见了，工作怎么样？”他把自行车推到我面前，亲切地问道：“老D怎么样？”

“她，唉！她被揪走了，不知揪到哪里去了，我正在找她。”

他用惊愕的眼光望着我，忙问：“是哪一边人揪的？”

我猛地想起，他是B派的一个小头儿。我高兴地直率

地说道：“是你们的人！我刚到你们指挥部去问，没有让我进门。”

梁东一点不迟疑，爽快地道：“没有关系，坐上我的车，我带你去，老 D 是死老虎，六十多岁了，老揪她干什么！”

我心里像打开了扇窗子，阳光照进了心房，立刻感到一股温暖。老梁同志，你真好呵！

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边，他把我带到了基建大队的楼房，老梁径直把我带进指挥部的办公室，里边的几个人我都认识，他们迎出门外，把我拦在过道里。我开门见山把今早的事说了一遍，请他们告诉我 D 的下落。谁知他们也推说不知道，还说：“中国地方这么大，一个大右派，她有本事飞出国去？”

我望望梁东，气怏怏地往外走。在楼梯口我遇见了原在场部党委会工作的周泉， he 现在是 B 派的一个负责人。我有点忧郁地望着他，心里满是失望、气愤。周泉没有任何表情地和我一起下楼，一直走到大门口，分路时他小声对我说道：“老 D 可能是到汤原去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站住了，急切问道：“真的，到汤原去了？”

“大概是的。汤原 T 农场来人揪她的。”

我抬头望望太阳，想到衣服上钉着一大块白布招牌的 D，一路上可能发生的情景，我大声说：“我要赶到汤原去。”周泉仍是小声说道：“去看看也好，她岁数那么

大了。”

我什么话也顾不得说，大步离开了他。我要搭去鹤岗的班车，从那里搭火车到佳木斯再转车去汤原。谁知道这一路会怎么样呢？

离 乱

下午，我搭上了从萝北去鹤岗的汽车。东北冬天黑得早，三点多便黑下来了。我挤在后边，心里想着真的 D 是到汤原了吗？要真是就好了。从 1958 年夏天，我们在汤原 T 农场六年多，D 一直在畜牧队工作，在群众中得到好评，交得有知心朋友。可是现在呢……我突然想起近年来 D 在 P 场历次受批挨斗的情景：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，被踢伤腰骨，半个多月下不了炕；她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，摔在地上，脚背肿得好高，找不到药，托熟人到兽医院才弄到一点药敷治……这些她都无言的忍受了。我每次问她，她总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。邻居见她这样受折磨，都同情她说：“唉，过这种日子倒不如死了好。”可是她反倒宽慰人家道：“怎么能死呢？再苦也得熬过去呵。”D 一向是很重感情的人，有时很脆弱，受一点委屈就想得很多，但这时我更看出她的倔强。十年来她总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愉快地工作。她的一颗心总是放在一些人不屑于一干的事情上，那样神圣地孜孜不倦地喂鸡，当打盲教员，做家属工作，同她一块的人都爱她，把她看成自己人，谁也没有想到她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曾经享有荣誉的作家。

近一年多来，我们的日子没有一天是平静的。哪一夜不提心吊胆等着虎狼似的来抄家的人群？可是D在这种时候，却特别显得超脱。她对那些打过她的年轻人从不怨恨，她总对我说：“不能怨他们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。”她对那些曾用各种方法保护过她的人，念念不忘，总是高兴地说：“世界上好人还是多数！”在巨浪没顶的时候，在激流冲卷，随时可以把她卷走的时候，她对世界保持乐观，对人类抱有信心，她具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呵！

到了鹤岗车站，我没有心思去看站上的那股乱劲，只是跟着人群拥挤翻滚。佳木斯车站我是熟识的。1958年冬天我和汤原T农场的战友们一起参加鹤岗到佳木斯的复线土方工程，每逢节假日，我们回汤原，大概都是在这里转车，常常一呆就是半宿。现在佳木斯车站的两个大厅都挤满了人，有一片一片坐在地上的，有一堆一堆站在一块的。原来的母子候车室无形中消失了，现在谁年轻力壮谁就能逞英雄。原有的书摊、茶水站都看不到了，到处只是人堆，烟雾缭绕，嘈杂声喧。我趑到一根柱子边上，席地而坐，渐渐瞌上了眼皮。在朦胧中有人轻轻碰了我一下，我睁眼一看，一顶蓬蓬松松的皮帽底下露出一张瘦脸，是T农场机务科的小郑。他警惕地朝四面望望，才低声道：“老陈，你这是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去汤原。”他忙握住我的手，凑近我耳边说：“汤原，今天一早发生武斗，你赶去

干什么！”我更担心了，忙问：“什么，武斗！老D今天早上刚被揪回农场，你听到什么没有？”他叹口气，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被围在汽车队五六天了，缺水断粮，家属送饭都送不进去。今早武斗开始，人家真枪实弹，我们有三个人冲出来都失散了。”

我和小郑过去只是认识，但从来没有这样亲近，真像是“他乡遇故知”了。他接着和我谈了一鳞半爪的点滴新闻。我曾听说汤原T农场也分成了两大派。现在看来小郑是一派，揪走D的是另一派，这一派势大。两派里都有我的熟人，我知道他们原来都是患难相助的垦荒战士，有的还是抗美援朝时上甘岭战斗中同生死的战友，如今竟成了刀枪相对，不共戴天的仇人。真是难以理解的变化啊！

开始验票进站了，小郑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说了一声你们保重，扯低了帽檐，便匆匆离去，他把我丢进一个梦似的境地。原来他是一个很稳健的小伙，如今却像一只惊弓之鸟。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人们变成这个样子！我们P农场也发生过几次武斗了。我曾经看见一群群的人，拿着粗棍，举着长矛，吆喝着从我们茅屋外边的路上呼啸而过；我也听到过手榴弹炸塌农场医院候诊室的轰鸣和远处的枪声、冲锋号声；我还目送着他们为死者出殡的行列。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？把好好的劳动场所变成瓦砾战场，把同洒血汗的战友变成你死我活的仇人，少数人停产闹“革命”成了趾高气扬的英雄，更多的坚守劳动岗位的战士却

成了生毋宁日的芸芸众生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（形式上当然我是一个摘帽右派），我二十岁投身革命，我是忠于党的，现在我仍是热爱着党的，可是为什么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被弄成同胞们自相残杀，让我怎么理解呢？

踪 影

出了汤原车站，摸黑赶路。拐了一个弯，快走到 T 农场的木材厂附近，突然有人喝道：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我答道：“是我。”这时两边地里出现了好几个人影，远远地围了上来。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，一个朴素坚实亲切的声音嚷道：“这不是老陈吗？老陈，你到哪儿去？”原来是 1958 年我刚到 T 农场时我们班的班长张礼同志。我握着他伸过来的手，问道：“老 D 到这里来了吗？”他似乎有点难为情的样子，答道：“来了，在我们这里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整天来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。我爽朗地说道：“我就是到你们这里来看老 D 的。”张礼把我引进木材厂的一栋屋子。

屋子不小，靠墙一铺大炕，睡满了人。张礼让我坐在炕对面的凳子上，对着火炉，他们五六个人围在我身边，我们亲密地叙起旧来。我这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到幸运。

张礼过去同我在第二生产队劳动，是农场有名的劳动模范，哪一年我都为他整理模范事迹的材料。他是从铁道兵部队转业来的，为人忠厚老诚。我今晚到场先遇见他真

巧极了。我开门见山问道：“老张，真是你们把老 D 揪来了？”张礼带点腼腆的样子笑道：“是的，今天上午就来了。”我问道：“老 D 在哪里？我是来看她的，给她送眼镜、衣服来的。”

他们几个人给我又倒水又敬烟，尽说宽心话。张礼道：“老 D 在武装排，就是她工作过的畜牧队，那都是熟人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看情势我是走不了了，半夜三更的，只好呆在这里了。

他们对我毫无隔阂，先问我是哪一派的，是什么观点。我也问到一些熟人，他们用多少带点骄傲的语气回答我“我们这边的”，或者用气愤的语气说“对立面的”，连张礼那样一向厚道持重的人也是这样。

我听说有两个熟人在武斗中打断了腿住医院了，心里很难受；又担忧 D 的处境。他们倒安慰我了：

“你只管放心，到我们这里，一根指头也不会碰到她身上。”

“你们离开我们才三年，D 老多了！”

“你们在这里有群众，老 D 不会吃亏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们把她揪来干什么？”

张礼笑了：“老陈，你还不明白？老 D 是大右派，在农场六年多，有威信。现在是要肃清流毒。管它什么毒，总得肃肃嘛。你还不不懂？”

我的确不懂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，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？难道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人，只能不好好工作，只应该装出一个坏人的样子，才没有流毒可肃吗？自然我只能苦笑一声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礼陪同我去了武装排。

咫尺天涯

到了原来畜牧队，虽然房屋依旧，可是四处是垃圾。三年前畜牧队的那种整齐干净，欣欣向荣的环境已经看不到了。五彩辉煌琳琅满目的俱乐部，现在塞满了用木料钉起的上下两层大通铺，住着武装排的人，我被迎了进去。许多熟人看见我，都围上来问这问那。我有什么可说呢，我是来看 D 的，而他们却奉命不准我见 D。他们热情的招待我洗脸、喝水、吃饭，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得很热情，可是在某些方面却又做得很冷酷。他们原来都是好人，遵守纪律，团结互助，刻苦劳动，努力学习；现在看来也还是好人，可是却拉帮结派，停止生产，搞什么“文攻武卫”，攻这里，冲那里，毫不手软；还到 P 农场，揪劫走 D，不准我们见面。我对他们说：“从古以来，死牢里的囚犯还允许家里人探监咧。”

他们见我气愤，便又宽慰我。他们透露说：“八点钟要开大会，批斗原来农场党委书记和农业科长，D 是陪斗。会后用汽车载到汤原县城里游斗，就没有什么事了。”他们劝我留在武装排休息。

一会，一个年轻人走到我面前，旁人向我介绍道：“这是许芳的小弟弟，那年随着他姐姐一同听 D 讲文化课时才九岁。”许芳的小弟弟欢欢喜喜地告诉我，他就要送 D 去场部开大会，他会告诉 D 说我来了。我心里真像刀割一样。D 看见她八年前哄他读书的小孩，现在背枪押着她游街、批斗，这对她将是如何的嘲弄和难堪！这位年轻人还高兴，他到底高兴什么呢？高兴 D 要挨斗还是因为自己快要见到 D 呢？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走样了。

游街的汽车远远走过去了，我沿着雪地上辗过的车轮痕迹缓步行进。我回想起去年在 P 农场，D 第一次被拉去游街。我从文化宫工会办公室的窗口，远远望见她戴着高帽，涂黑了脸，走在人群当中，我心如刀绞，不忍卒看。现在什么批斗、游斗、陪斗都已司空见惯，成为家常便饭，可是我的心呵，我仍然不能不怵怵颤抖。D 六十岁了，风中之烛，我总担心她经受不住这连续不断的暴风雨，担心这些粗暴、凌辱、折磨会压碎她的倔强精神，她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实在太多了。可是当她第一次游街回来，却平静地对我说：“很想写一封信给孩子们，告诉他们，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。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，我就当一次反派。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呢。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呵！”现在呢，现在她又在想什么？这种日子到底有没有尽头！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一个清平世界呵！

下午，我又坐在畜牧队的俱乐部里，墙上还贴有当年

D画的高举三面红旗的彩色画，虽然残破陈旧，但在很多地方还能看出画匠的用心细致。我给D的衣物由他们转交了，D给我写的一纸收条也贴在我胸前的口袋里了。她短短的几句话增加了我的勇气。我仿佛又看见了她那高昂的、对周围的一切横逆不屑一顾的神态。我望着壁上的残画，更加坚信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情。我还有什么不放心呢？我决计搭傍晚的车回P场，我将收拾那间小屋，收拾一片心情等着她回家。

二 访

李 威

两个星期之后，我又不得要领地迟迟走出那使人发生各种猜想、疑虑的畜牧队。张礼陪我出来，他想讲两句安慰我的话，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。我惶惶望着四野，灰色的太阳冷冷地照射着铺着厚厚一层的雪地。他们打算怎样处理她呢？张礼没有透露一句半句，只是一个口调：“放心吧，我们一个指头也不会碰她的。”

我正猜疑不定，忽然在迎面一条通厕所的小道上走出一个人来。我来不及跑过去，她已经直扑向我，而且急促地说道：“李威来了！”

我注视着，她，注视着我苦苦悬想了两个星期的D。我要仔细问她，趁此机会问个明白，但她不等我走近，不等

我去问她，就急忙走过我身边，而且重复地说：“李威来了，他在屋子里，他望着我们呢。”

我还没有理清发生了什么事，她已经快步绕过俱乐部走向后边的大院去了。

张礼惊讶地站在我后边，呆呆地望着我和急速走远了 D。

我转身望着俱乐部，在紧靠大门边的那间屋子的窗户后面，仿佛有两个人头晃动。我问张礼：“P 农场来人找老 D 吗？”。

张礼答道：“来了两个，他们通过指挥部，说是问老 D 要什么材料。”

张礼回屋去了。我踽踽在雪原上，李威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有些人真是成了不可思议的、难于了解的人呵！

李威原是 P 农场场部的通讯员，转业战士，共产党员，抗美援朝回国后在四川的一所军校学习，1957 年转业到东北垦区。1964 年底我们到 P 农场后，他和我们来往很密，常给我们送书送报，对我们很热情，又常把自己的习作送给 D 看。D 耐心地为 他修改，讲解。我们见他没有成家，过年邀他吃饭，D 为他烧牛肉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他参加了一派。两派斗争激烈时，他被对方抓走了，吃了些亏，以后就听说他四处闹事。开始我们还有心想找他谈谈，有几次我在路上远远看见他横眉怒目，厉声呼叱，只

好退避三舍，远远地就绕着过去了。有一回我到邮局去取漏送的报纸，我走进分发室帮忙找寻，李威忽然从里间跳了出来，我还想和他招呼，他却瞪着双眼吼道：“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快滚出去！”我正想说话，他连声骂道：“什么摘帽右派，还不是右派！右派没有个好东西！”

邮局的几个办事员都围拢来，有人拦着他，有人劝我走。我报纸也没拿，忍着性子走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和D吃过饭不久，李威带着几个红卫兵闯进我家，气势汹汹地站上炕头，指挥那几个学生，翻箱倒柜。D平静地望望他，他却狠狠骂道：“你敢瞪眼看我！你摆什么架子？凭什么要我给你们反革命分子送书送报！”他大骂过去的老场长，说他包庇D。我回想起老场长那时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教诲，对他的钟爱。而李威那时也是那样高兴地听场长的话。怎么忽然一下变成这个样呢？

他们闹了一阵之后，便扬长而去。我隔着窗户看见走在最前边的李威的肩上，扛着我的自行车。我追出门嚷道：“李威，你为什么拿走我的车子？我上下班都靠它咧。”只有一阵嘲讽的笑声回报了我。

现在李威追着D到汤原来来了。看D适才的样子，他一定是又动手要威风了。原来一个那样敦厚的人，怎么忽然变得这样凶悍，蛮不讲理呢？过去彼此也有过好感，相处不错，怎么一下就变成仇敌，那样步步苦逼，毫不容情呢？听说他打过好多人，现在他不会打D吗？看来他已经

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了，一个失去理性的人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好像冻结在这雪的原野上了。

夏人杰

我不知在雪地里走了多久，傍晚我在去指挥部的路上碰到了夏人杰。夏人杰也是二队的农工，1958年冬从山东支援边疆建设来农场，比我晚半年。这时他披着一件黄色的军用大衣，戴一顶军用的栽绒棉帽，背一杆大枪，一看见我两手就把我抱住，大声道：“问题解决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回畜牧队去，今晚不走，在我那里睡吧。”

他现在是武装排的副排长，上次来没有见到他。我们在二队时很熟，但没有现在这样热乎，而且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威武，这样强烈的主人翁感。

我用亲热、迟疑的眼光望着他说：“我想找指挥部的负责人谈谈。”

他挽着我一个劲儿往回走，快乐地说道：“不用去了。那个什么威，我们把他轰走了。什么造反派，简直像土匪！哪有这样的造反派！你们在那里，一定给折腾够了……”我跟着夏人杰朝畜牧队走。

夏人杰继续说道：“那两个家伙一早就来了，把D叫去审问，我就招呼我们的人，进屋去看看，他们没有敢怎么样。过一会，我派人叫D出来吃饭。中午饭后，他们又把D叫进去，这回我站在门口听，他们问D对你说了些什